

# 博弈论视角下《红楼梦》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比研究

——以杨、霍译本为例

张芝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 摘要

本文以博弈论为视角, 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分析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决策机制。研究运用尤金·奈达的文化分类框架, 结合囚徒困境、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等博弈论概念, 对生态、语言、宗教、物质、社会五类文化负载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 杨译倾向于与原文作者合作, 采用直译策略, 力求忠实再现文化内涵, 但可能增加目标读者的理解难度; 霍译则更注重与目标读者合作, 采用本土化改写, 提升了译文可读性, 但难免牺牲部分文化特色。两种译本的策略差异反映出译者在忠实原文与适应读者之间的博弈过程。结论表明, 翻译活动是多方利益的协调与权衡, 译者应在语言、文化与读者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通过策略性选择实现文化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追求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

## 关键词

《红楼梦》, 博弈论, 文化负载词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 Xianyi and David Hawkes Versions

Zhi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y Yang Xianyi and David Hawk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Employing Eugene Nida's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and incorporating game theory concepts such as the Prisoner's Dilemma, Nash Equilibrium, and Pareto Optimality,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ve categori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ecological, linguistic, religious, material, and socia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Yang's translation tends to cooperate with the source text author, adopting liter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faithfully reproduce cultural connotations, which may increase the comprehension difficulty for target readers. In contrast, Hawkes' transl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ooperation with target readers, employing domesticated rewriting to enhance readability, though at the cost of partially sacrificing som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strateg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s reflect the translator's game-playing process between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and adaptation to the readers.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translation is a coordination and trade-off of multiple interests; translators should seek a dynamic balance among language, culture, and readers' needs, maxim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strategic choices, and striving for a state close to Pareto Optimality.

## Keyword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Game Theory, Culture-Loaded Word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其中蕴含的大量文化负载词，如称谓、典故、俗语等，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也成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些文化负载词既要求译者忠实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又需兼顾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与接受能力，在忠实与可读性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动态平衡。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择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原作者原意和写作风格、目标读者接受程度、文化差异等，这种多方博弈的特性使得翻译成为一场隐形的“博弈”。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决策行为的理论工具，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博弈论，可以清晰地刻画译者如何在不同的翻译策略间进行权衡，从而最大化文化传播的效果与读者的接受度。

本研究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的《红楼梦》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聚焦两位译者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策略差异，结合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纳什平衡和帕累托最优理论，对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策略选择进行系统分析。同时，以尤金·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博弈行为与翻译策略。通过这些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译者如何平衡文化传递与目标读者理解之间的矛盾，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发。

## 2. 博弈论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相互作用中如何决策及其均衡问题的一门理论[1]。该理论通过数学化处理复杂的决策关系,为决策行为提供逻辑化支持。由于其广泛适用性,博弈论被应用于经济、政治、管理、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2]。

20世纪50年代是博弈论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合作博弈达到理论巅峰,非合作博弈也快速崛起并奠定了其核心地位。约翰·纳什提出了“纳什均衡”,为非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基础。塔克提出的“囚徒困境”这一经典模型揭示了个体决策中的矛盾,并推动了非合作博弈的进一步发展。此后,诸多学者们如泽尔腾、海萨尼、克瑞普斯、威尔逊等纷纷拓展了其理论边界[1]。

博弈论通过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展示了数学工具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巨大潜力,为分析复杂人类行为提供了科学模型与方法。这些理论成就不仅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还为其未来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 3. 博弈论在翻译中的运用

维特根斯坦率先将博弈论与翻译研究联系起来,他富有洞见地将博弈和翻译过程进行类比,提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游戏[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仅是被动的语言转换者,更是一个需要在复杂多变的语言文化情境中进行策略选择的决策主体。翻译活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场多方博弈,翻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活动,这一活动中涉及到的参与者包括:作者、译者、目的语读者和翻译发起者。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他参与者不断地进行博弈[2]。博弈论帮助我们理解翻译中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策略博弈。此外,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翻译决策中的冲突与协调。通过引入这些概念,可以更系统地探讨翻译活动中策略选择的逻辑与规律。

### 3.1.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描述了两个参与者在合作和背叛之间做出决策的情境[4]。在翻译中,这一模型可以形象地解释译者在平衡源文本和目标读者需求之间的决策困境。译者可以被看作是个“囚徒”,而原作作者和目标读者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另一个囚徒。译者的任务是分别与这两方进行博弈,通过策略选择实现尽可能优的翻译结果。

在译者与源文本作者的博弈过程中,译者可以采取与源文本作者合作的策略。在翻译中,与作者合作可以理解为译者忠实再现原文的语言风格、情感表达和文化特性。这种策略的优点在于保留了原作的独特性和文化内涵,但可能导致目标读者因文化隔阂而难以理解译文。译者也可以选择背叛源文本作者策略,即译者为了让译文更符合目标文化的语言规范和审美习惯,选择舍弃或改编原文中某些带有文化负载的元素。尽管这样做可能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但会削弱原作的异域特色,甚至偏离作者的创作意图。

相应地,译者与读者的博弈也可以分为合作和背叛。与目标读者合作意味着译者在翻译中倾向于选择更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减少文化冲突或语言障碍,以迎合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选择背叛读者的策略则表现为译者保留原文中的独特表达和文化特质,不对其进行过多的改写或解释。

在囚徒困境的框架下,译者的任务是在多方需求中找到最佳平衡点,避免过度倾向任何一方,以实现整体效果的最大化。

### 3.2. 纳什平衡

纳什平衡是博弈论中另一个重要概念,指参与者选择对自己最优的策略,在翻译活动中,纳什平衡可以用来描述译者如何在多方需求之间达成平衡。例如,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通常需要在保留原作风格和适应目标读者之间找到平衡。若译者完全忠实于源文本,可能会导致目标读者因文化差异而难以接受;反之,

若过于迎合目标读者,可能会引发对原作意义的扭曲或弱化。在这种博弈关系中,译者需要考虑作者、读者以及目标文化的多方需求,并选择一个策略,让每一位参与者的利益都能获得最大限度地满足。

### 3.3. 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描述的是一种资源配置状况,在此状况下,如果任何个体想要增加自己的收益,就必然会牺牲至少一个其他个体的收益。在翻译中,帕累托最优可被用来衡量译者策略的优化程度,即如何在满足多方需求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升翻译效果。译者在翻译时,需要面临资源的分配,在不破坏原文含义、原文负载的文化以及译文可读性的情况下,让至少一个方面的情况变得更好,也就是选择增加文化因素或是增强译文可读性[4]。

## 4. 文化负载词

美国语言学家 Eugene Nida 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五类[5]。英国翻译学家 Mona Baker 则认为,文化负载词是源语言中特有的文化词汇,这些词汇在目标语中难以找到对等表达[6]。我国语言学家包惠南指出,文化负载词反映国家或民族独特历史、社会、环境、宗教和风俗的词汇、成语和典故等[7]。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地域特色。这些词汇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组合,更是特定文化背景、社会习俗、思维方式和历史记忆的浓缩体现。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在目标语言中有效再现其文化意涵,而不使其在转化过程中失去原有的独特性或引发文化误读。

基于此,本文将以博弈论和尤金·奈达对文化的五类划分为理论框架,结合两位译者的译本,分析其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不同取向和策略。通过对比研究,本文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借鉴与指导。

## 5. 博弈论视角下《红楼梦》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 5.1. 生态文化负载词

例:“难道……您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

杨译: Is...you as an immortal on his head to Mount Wutai?

霍译: When you go to heaven...

在原文中,“上五台山”是指对死者的尊敬和对其成仙的隐晦暗示。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圣地,象征着灵魂的升华与成佛。然而,西方读者并不熟悉五台山的文化背景,因此直译为“Mount Wutai”可能无法有效传达这一象征意义。杨译的直译策略可以看作是与合作,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但这可能导致目标读者在文化理解上的困难。通过保留“Mount Wutai”,译者试图保留源文化的深刻内涵,但却未能有效解决文化传达上的障碍。而霍译则采取“背叛”原作,翻译为“go to heaven”,这一翻译牺牲了原文中的佛教象征和王熙凤对贾母的奉承意味,转而使用了目标文化读者更容易理解的表达。虽然这种策略使得译文对西方读者更加亲近,但它也让原文中的细腻文化和情感意图被模糊了。此外,也会让西方读者误认为王熙凤信奉着基督教。

### 5.2. 语言文化负载词

例: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烧。

杨译: As long as the mountain's there we shan't lack fuel.

霍译: Keep the hill green, keep the hill green. And you'll never lack fuel for winter again.

原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智慧,强调的是保持基本条件和生命力,其他一切都可以再来。这个俗语在中文语境中深刻地传达了生活的哲理与处世智慧。在翻译中,杨译和霍译都尝试传达这一寓意,但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两个版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杨译使用直译策略,与原作合作。这一翻译保持了原意,直白地传达了俗语的核心思想。此翻译虽然忠实,但其句式和表达方式可能让目标语言的读者感到一些陌生,特别是在文化和语言差异方面可能稍显生硬。

而霍译采用了创造性改写,背叛了原作,使用诗体形式。通过运用重复和押韵的手法,霍克斯不仅忠于原意,还提升了翻译的艺术性和可读性。这种风格符合英语语言习惯,并通过重复的句式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使句子更加朗朗上口。这种策略实际上提供了更高的读者利益,并且保留了原意的核心,构成了纳什均衡。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博弈中,霍的策略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平衡原文的忠实性和目标语的流畅性,既忠实于原意,又能为读者提供流畅的阅读体验。因此,达成了帕累托最优。

### 5.3. 宗教文化负载词

例:……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杨译: ...at Iron Threshold Temple; Qin Zhong Amuses Himself in Steamed-Bread Convent

霍译: At Water-moon Priory .../And Qin Zhong discovers the pleasures that are to be had under the cover of darkness

杨采取了直译策略,其翻译忠实呈现原文,把中国独有的文化背景及宗教词汇予以保留,只是,这很可能让西方读者觉得迷茫,原因在于“铁槛寺”和“馒头庵”并非西方文化中常见的用语,且缺乏足够的文化、语境方面的解读。因此,西方读者可能不容易理解这些词汇背后的含义,可能导致可读性下降。

因其馒头做得好吃,“水月庵”又名“馒头庵”。霍则删除了“铁槛寺”的翻译,并将“水月庵”直译为 Water-moon Priory,同时对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这种“背叛”原作的策略更加灵活地适应了西方读者的文化和认知背景,使得译文不仅忠于原意,同时也能增强可读性和理解度。这种策略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博弈中构成了纳什均衡,也达成了帕累托最优。

### 5.4. 物质文化负载词

例:因嫌纱帽小

杨译: Resentment at a low official rank

霍译: The judge whose hat is too small for his head

杨将“纱帽”翻译为“official rank”,虽然在形式上损失了原文中的“纱帽”这一形象,但却准确传达了原文的隐喻意义,即“官职低”。这种翻译策略避免了字面上的误解,保持了原意的传递,且避免了文化误读,因此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理解,构成了纳什平衡。虽然失去了某些文化意象的表现,但在确保意义传达方面没有产生障碍,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而霍将“纱帽”翻译为“hat”,误解为字面意义上的“帽子太小”。这一翻译误解了原文的隐喻性质,导致失去了“官职低”的比喻含义,可能会使目标语言读者产生困惑,无法准确把握原文的文化内涵。这种误解造成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影响了读者的理解。

### 5.5. 社会文化负载词

例:……三媒六证。

杨译: ...a procedure for marriage and it should be announced in a decent way.

霍译: ...with go-betweens and witnesses everything open and above-board.

杨译与原作合作, 忠实于原文, 保留了“三媒六证”背后“婚姻需严肃规范”的内涵。避免了对具体文化意象的过度诠释, 直接传递深层意义。而霍从目标语言文化出发进行了再创造, 与读者合作, 选择了“go-betweens”和“witnesses”来传递“三媒六证”的文化内涵。强调了人证和透明的概念, 与西方婚姻文化中的合法性和见证观念契合。在形式上做了调整, 使表达更加生动具体, 贴近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杨译在忠实原作上做得更好, 霍译则更倾向于贴近西方文化, 这两种译文称得上是各有长处, 平分秋色。

##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杨宪益与霍克斯译本的对比分析表明, 《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并非经验性的简单权衡, 而是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展开的策略性决策过程。基于博弈论视角, 可以从收益结构、博弈性质与时间维度对这一过程进行概括。

文化负载词的类型影响收益分布。生态文化与宗教文化词在跨文化传播中呈现明显的认知不对称, 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掌握存在差距, 翻译过程表现为不完全信息博弈。杨宪益通过保留原文表达, 将文化理解成本转移给读者, 以维持源语意义的完整性; 霍克斯则通过删减和归化处理降低理解难度, 提高译文的接受效率, 这类情形下的均衡结果更倾向于读者一侧。

翻译策略的形成依赖于博弈性质。物质文化负载词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较强对应关系, 翻译过程中选择空间受限, 译者需要在表达形式与意义传达之间作出取舍, 整体呈现高约束特征。语言文化负载词如俗语与诗性表达具有较强的可重构性, 通过韵律与修辞调整可以实现意义再现与形式优化的统一, 使翻译过程表现出非零和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功能对等与效果提升。

译者身份影响博弈的时间结构。翻译活动并非孤立行为, 而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重复的决策过程。杨宪益重视文化差异的保留, 体现出对源语文化传播的持续取向; 霍克斯侧重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与审美体验, 更强调译文的即时接受效果, 不同策略反映出译者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选择差异。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宜简化为归化与异化的对立关系, 应视为由文化属性、读者认知负荷与译者策略共同作用形成的多维决策过程。翻译实践可依据不同类型文化负载词的特征调整策略, 在保留核心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实现更稳定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 参考文献

- [1]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2] 王甜丽, 王德田.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博弈[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 2012(1): 97-98.
- [3] 洪诗谐. 博弈论视角下翻译合作研究[J]. 黑河学院学报, 2018, 9(6): 137-138.
- [4] 杨寅康, 陈萍. 博弈论视角下的《老人与海》三个中译本比较与分析[J]. 今古文创, 2024(11): 104-106.
- [5] Eugene, N. (1945)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s. 194-208.
- [6] Mona, B.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Routledge.
- [7]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